

【论 文】

同一个观点，竟被认为对国共两党的民族理论政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间是否存在悖谬或误解之处？

一九四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误会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三）

熊芳亮

1939年2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警示“民族自决”之类的口号、“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中国内部的“民族”划分所带给中国的现实危害，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文化集团”来替代“民族”的划分，并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¹。顾颉刚的文章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激烈争论，傅斯年²、吴文藻、白寿彝、费孝通³、翦伯赞⁴等诸多名家参与其中，并最终延伸为国共两党在民族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交锋。也正因如此，这场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隐而不彰”，“不但这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事后都较少提及，甚至相关文章也基本没有收入个人文集”⁵。直至近年来，学界才对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大讨论，进行了比较细致、周密的史料挖掘和理论分析⁶。这种关注一方面自然要归功于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相关重要当事人的“全集”或“文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公开出版，使长期淹没于世的学术文献重新公诸于世。另一方面，也有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学界关于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进行的重新思考和“再反思”争论的因由，以古为鉴、借古喻今的意味显而易见。也正因为如此，正确、真实地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有学者认为，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为蒋介石的“国族一宗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⁷。而马戎则推断，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¹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第9期。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106页。

² 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³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1日，第19期。

⁴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六卷第1期，1940年4月。

⁵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⁶ 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忆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第07版。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马戎：《“民族”之辩——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1—4），《中国民族报》，20012年11月2日、9日、16日、23日。

⁷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于《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



观点，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也有一定影响”¹。而笔者则认为，这只是后人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国族-宗族”论二者关联性认识上的一种“误会”。

第一，就“国族”论来看，“国族-宗族”论选择性地借鉴了“同源说”和“融合说”两种观点以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统一性。为了调适“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史学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是民国学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一个重要理论路径——其中又可以分为“融合说”和“同源说”。“融合说”认为，“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等各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血缘融合”而成，持此观点主要有王桐龄、林惠祥、陶希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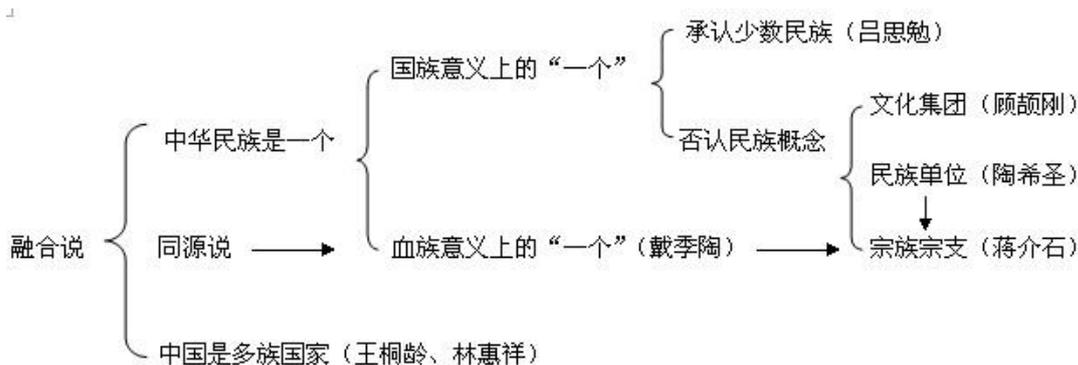


图 1：“国族-宗族论”与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谱系

顾颉刚等人。1928年，王桐龄在其《中国民族史》(1928)中提出，“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中华民国”“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亦绝无单纯血统”²。1929年，陶希圣在其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中，提出“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言语、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³。1937年，顾颉刚提出中国各族是“经过了几千年互相混合同化的结果”，“国内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无所谓汉族等等勉强分别的族名”⁴。1939年，林惠祥在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史》(1939)中提出，“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其他各族亦皆有别系之成分”⁵。“同源说”则认为，汉、满、蒙、回、藏各族自古以来就是“系出一宗，族同一祖”，同祖同源。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戴季陶。1930年，戴季陶在为马鹤天所著之《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写的序中，提出“汉族之与蒙古民族，系出一宗，族同一祖，但视其面貌骨骼，便已足自信不疑，则两族之当亲睦协和共图其存在发展不待更述而自明矣”，且认为“蒙回俱族，其理亦同”⁶。无论是持“融合说”还是“同源说”，王桐龄、林惠祥、陶希圣、戴季陶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民族”与“血缘”相关，并且有着共同的理论目的，也就是试图论证和构建以“血缘”为基础的“国族”——“中华民族”概念。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¹ 马戎：《“民族”之辩——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一）》，中国民族报，2012年11月2日，第0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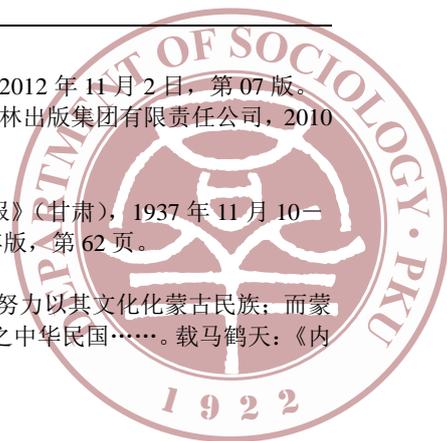
²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序》(1928)。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28/1934)，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³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1页。

⁴ 顾颉刚：《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讲演词》，《民国日报》(甘肃)，1937年11月10—14日。载于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2页。

⁵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0页。

⁶ 戴季陶在序言中还说：中国建国之基本，为汉族之文化，故今后汉族应努力以其文化化蒙古民族；而蒙古民族应努力接受汉族之文化，复于上古同族同宗之本原，而造成真正统一之中华民国……。载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



关于“中华民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为同源），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即为融合）”的表述，显然同时借鉴和采纳了“融合说”和“同源说”这两种观点。同时，《中国之命运》也没有放弃戴季陶所主张的“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仍然坚持称“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就是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这“八德”和“四维”¹。

但是，蒋介石对学者意见的借鉴和采纳，完全取决于学者的观点和结论是否迎合或符合其建构和调整“民族主义”的理论需要和政治动机，而不是在学者的观点和结论的基础之上建构和调整其“民族主义”理论。在“国族”与“民族”概念的关系问题上，陶希圣、戴季陶、顾颉刚都将“国族”等同于“民族”，但陶希圣、戴季陶是以“血缘”为基础论证和构建“国族”/“中华民族”，唯有顾颉刚所使用的“国族”概念最契合孙中山基于全体国民基础之上“国族”概念²，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³，强调“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⁴。1935年，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也曾提出“民族是民族，国族是国族”两者“不容混淆”的观点，认为“现今世界上，决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没有以一民族而组织一国家的”，“一国家中，总包含好几个民族”，“中国自然也是如此”⁵，堪称睿见。但蒋介石恰恰试图在血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构建“中华民族”。由此可见，真正影响、主导“国族-宗族”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的，是戴季陶、陶希圣等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顾颉刚或其他学者的意见。

第二，就“宗族”论来看，其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来源于蒋介石集团御用理论家的理论创造。关于《中国之命运》作者，史学界尚有诸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命运》是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替蒋介石“捉刀”完成的作品；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为《中国之命运》也是倾尽心力，因此该书完全体现的是蒋介石的思想和主张。但无论是哪个观点，都没有排除陶希圣等“御用理论家”在《中国之命运》写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宗族”论这一部分而言，陶希圣显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30年，陶希圣在其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就曾以“民族的单位”称谓少数民族，他写道：

从中国的政治的领域里面做一番粗略的搜查，我们已经看见了许多的民族的单位（Ethnic Units），如甘新的回民，川滇的苗瑶，外藩的蒙藏⁶。

而“国族-宗族”论中最关键的观点，即将汉、满、蒙、回、藏各族称为“宗族”，同样与陶希圣存在密切关联：虽然陶希圣并不认同“同源论”，但却有将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视为“宗族”的“前科”。陶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提出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习惯以“宗族意识”隐蔽“民族意识”，而北方“异族”在迁徙、征战中原的时候沿袭了这一做法，同样以“宗族传说”隐蔽“民族”差异。陶希圣论述道：

春秋以前，……当时有种族意识，却为宗族意识所点染。……春秋期间，种族意识已经发生和发达。种族意识受宗族意识的点染。种族以内又杂有宗族意识，很强烈的存在于其间⁷。

……

¹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一章。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7页。

²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参见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

³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106页。

⁴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参见《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6页。

⁵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序》（1934）。载吕思勉：《中华民族源流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⁶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6页。

⁷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5—96页。



（汉代以后）中国的民族融合……比秦代以前更进一步。西域、南越、西南夷的迁徙和匈奴的战争，至少使士大夫阶级乃至商人阶级发生民族差别的认识。但是，士大夫阶级却仍尊重宗族的传说，时以宗族意识隐蔽了民族意识¹。

陶希圣进一步论述道：“在这种态度之下，北方诸异族，如匈奴、鲜卑等等，依其向中原的迁徙和战斗，各持其宗族的传说，加入了民族融合的过程”²。在如何认识汉、满、蒙、回、藏等各族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上，陶希圣将汉、满、蒙、回、藏等族视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单位（Ethnic Unit）”³，而顾颉刚则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三大“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替代各族的名称⁴。蒋介石显然采纳和借鉴了陶希圣的观点。对蒋介石这样的政治家而言，给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所确定的替代名称，“科学性”显然并不是第一条件，各族群众的“意愿”显然更不是参考的重点，能否为其巩固统治地位“所用”、能否为各派政治力量“接受”才是首要考虑的内容。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推出“国族—宗族论”，在政治上显然是最佳选择：既看起来满足了国民党内要求推行“国族融合”政策的呼声，又顺应了社会各界呼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舆论，而且还能强化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政治继承者的形象。虽然“国族—宗族”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国族”的断章取义和刻意歪曲，但这对于蒋介石集团而言本来就轻车熟路——无论是戴季陶“纯正的三民主义”还是蒋介石“三民主义实程序”，无不是以歪曲、曲解、解构、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蒋介石，才是“国族—宗族论”真正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也只有蒋介石才有资格和胆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宗族”论是继承孙中山的“遗训”。

第三，蒋介石所倡导的“国族—宗族论”，不过是为维护其“抗战领袖”、“民族英雄”的声望和假象，满足其巩固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专制统治的需要而精心编造的政治谎言和理论骗局。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虽然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但其“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和“分治”、“分裂”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并没有丝毫改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终于一雪近代以降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历史，以巨大牺牲和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国际而言，中国已经跻身世界五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国际环境绝无仅有；就国力而言，经受住了长期战争考验的中国在民族凝聚力、军事组织力、政治动员力早胜抗战初期，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能力更加强大；就民意而言，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早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共同意志。然而，蒋介石竟然在此大好背景之下出人意料地重新回到了“民族分治”的立场。

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了实施“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凡对于他持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予以精诚的扶持其成长，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第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具备自治能力，与有独立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到达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的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第三，“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经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⁵。蒋介石提出的“三个原则”，再次将外蒙和西

¹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2页。

²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02页。

³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6页。

⁴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4—106页。

⁵ 蒋介石：《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70—175



藏划分在“国族”之外，提出要承认“外蒙独立”，扶持“西藏独立”，同时对他所称的“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厉行同化”。蒋介石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显露出其“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在“分治主义”的民族主义指导之下，蒋介石不惜以牺牲外蒙主权的代价，换取苏联政府的所谓“三项政治承诺”，并于1946年初启动承认了外蒙“独立”的所谓“法理程序”。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在解释其为什么放弃“外蒙主权”时称，“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¹。1959年，在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之际，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公然“许诺”将“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达赖集团关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地位”的“愿望”²。

由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研究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显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中“分裂”、“分治”的基本逻辑和专制、同化的政策取向，与蒋介石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在基本概念、理论方向、政治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和差异。认为学界为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或理论依据的看法显然是一种历史误解。与之相反的是，学界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结论或是出于批判蒋介石集团在民族政治领域的倒行逆施；或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时隔七八十年，我们依然可以从顾颉刚对国民党“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从吕思勉“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的批评之中，强烈感受到学者们理论良知和拳拳之心。虽然民国时期学者们试图以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回答和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的研究和结论是中国人民探索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体现。

【论 文】

蒋介石集团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显然绝非我们原以为的那般，只要简单地贴上“反动”的标签就会烟消云散，其背后所深藏的思想渊源与政治路径，更值得后人深思和警醒。

一九四二：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面相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四）

熊芳亮

抗日战争期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蒋介石集团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对“投降”、“分裂”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调整和调适，炮制“国族—宗族”论以缓解党内、党外和社会舆论的政治压力。这种理论调整和调适看似借鉴和采纳了学界的研究成果，顺应了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却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

页。

¹ 蒋介石：《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致词》。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五），（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21页。

² 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1959年3月26日）。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三），（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22—223页。

